

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

——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

□高丙中

[摘要] 能叙事才好成事,是表述主体才可能是社会主体。相对比较紧迫的是,海外民族志是疗治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病症的一剂良药。当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领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术上也会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 海外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表述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05-0002-05

Will and Academic Action to Perceive the Outsid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Ethnography on China's Social Sciences

GAO Bing-zho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nly when one is able to narrate, does he have the say; and only when one becomes the subject of expression, will he become the subject of the society. It is imperative to be aware that overseas ethnography is a great healer for China's imped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s compared to its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when overseas ethnography becomes part of basic knowledge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hey will witness greater and faster progress.

Key Words: overseas ethnograph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expressive community

一、到海外去

□ 号——“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 1919 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今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则萌发着另一种冲动,

一种积聚了很久、压抑了很久的求知之志,这就是:“到海外去!”(杨春宇:关于从“到民间去”再往“到海外去”这个脉络,我认为如果是说人类学,那么从 20 世纪 20 年代传入中国的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强调实地调查的,这么一个“不耻下问”的转变并不明显,如果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那么金石学家转变为考古学家靠的是科学的方法论和实地发掘,讼师转变为法学家靠的是吸纳西方法学思想,从社会科学整体上看并不必然与“到民间去”有关。那么“到民间去”是不是可以概括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的转型呢?各个学科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发展阶段,我觉得如果能细化一下,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之眼”的独特

* 此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走进世界丛书·海外民族志大系”总序。在总序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多位同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笔者在此选录其中的一些,见文中附注。

地位拿出来谈,将这条脉络改为从“到实地去”往“到海外去”,凸现出人类学方法意识上敢为各学科先的超前性会不会更符合我们的这个系列一些呢?笔者答:我把“到民间去”看做中国学界形成到实地、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做调查研究的风气的标志。^[11]我把“到民间去”与“到海外去”联系起来,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两阶段线索:从说中国如何如何之后,再发展到进入中国社会中做实证的调查研究;从说世界如何如何之后,再发展到进入国外的社会做规范的人类学田野作业)。

曾经,在大家都不能出国的时期,我们在政治关怀上满怀豪情地,当然只是浪漫地“放眼世界”。今天,出国旅行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了,“看世界”的欲望已如春潮涌动。中国的知识界要做的是以规范的学术方式“走进世界”之后“凝视世界”!

关于社会调查,关于经验研究,“到海外去”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会。社会调查的眼界有多宽,社会科学的格局才可能有多大。几辈知识分子在“民间”、在本土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中国科学学的当下格局。我们今天到海外去,到异国他乡去认识世界,则是为了中国社会科学明天的新格局。

二、到海外做民族志

中国人出国,在“镀金”、“淘金”、“挥金”之外,新增加了一个目标,这就是扎在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一种文化来观察,然后写出学理支撑的报告,名之曰“海外民族志”。虽然到目前只有十多个人怀着这个目标走出国门,^①但是它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却不同凡响。

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

在西方人类学的正统和常识中,民族志就是基于异国田野作业的研究报告,“海外”是民族志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它们是没有“海外民族志”这个说法的。

人类学民族志的标杆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玛格丽特·米德那批充满学术激情的青年才俊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著作所树立起来的。他们各自从伦敦、从纽约背起行囊,乘船出海,到大洋中的小岛和“野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及《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经典的民族志著作。他们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为人类学家并进而成为学术领袖的人物。他

们的职业生涯成为人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做民族志,总要有充沛的激情让自己想得够远,走得够远。在拥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学从业者的西方国家,虽然后来在国内社会做民族志的人逐渐多起来,但是,到海外做民族志还是一直被尊为人类学人才培养的正途。

不过,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共同体来说,民族志一直都是一种家乡研究,一种对于本乡本土、本族本国的调查报告,因此,“海外”从来都是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所缺少的一个要素,所未曾企及的一个视野,所没有发育起来的一种性质,当然也是今天绝对需要的一种格局。

一般都说中国人类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才有组织地把田野作业推进到海外,这项迟来的事业让我们终于可以跨越百年的遗憾。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具有人类学专业的国内高校正陆续把一个一个的学子送到海外开展规范的田野作业。

中国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的时代尽管迟来却已经大步走来!

三、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在关于世界的叙事中所占的位置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关联在一起的。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

学术是用文字表达的抽象观念。文字是个人一段一段书写的,但是抽象观念却不是个人意义上能够成立的。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伴随品——共同体造就学人,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共同体传承学术成果。反过来,学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的新生。

具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必须是表述者,必须是能够言说自我、言说他人的表述者。民族志是关于

^① 到海外做民族志,大致有两种做法:一是为了奠定人类学的学术生涯而到异域做一年的蹲点调查,并一定以学会使用当地人的语言为前提,最后写出专著作为博士论文;二是因为项目的需要而去他乡做调查,对于停留时间、语言使用和成果形式都没有硬指标的限制。本文主要是针对第一种做法(也就是所谓的“人类学规范”)而讲的。在法国求学的于硕博、贺震博士在法国这样做过,在英国求学的项颺博士在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做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研室从2002年开始正式启动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在9个国外和境外的社区完成了一年期的田野作业,它们是泰国(龚浩群)、蒙古国(宝山)、马来西亚(康敏)、印度(吴晓黎)、澳大利亚(杨春宇)、美国(李荣荣)、法国(张金岭)、德国(周歆红)、中国香港(夏循祥),并且在2个国外或境外社区的一年期田野作业已经进程过半,它们是俄罗斯(马强)、中国台湾(林幸颖)。

共同体表述地位是否存在的证明,是共同体通过特定的表述得以构成或显现为主体的知识途径,是共同体的表述者身份的名片(吴晓黎:都应该看做“之一”而不是唯一,民族志只是比较晚近的一种知识形式)。

虽然民族志的主笔者是个人,虽然民族志的材料来自被访谈的个人,虽然一部一部的民族志都有各个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在集合起来的总体效用,民族志却承载着共同体对共同体的结构性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与非洲和拉美的关系,既是由西方所生产的器物所支撑的,由西方的武器所打出来的,也是由西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叙事所建构的。这种结构性关系是难以改变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改变,只能由器物生产的实力和叙事的表述能力所构成的合力来促成。

在前现代,作为表述者的共同体是各自说话,并且主要是自说自话,偶尔才说及他人,对他人的表述和自我表述都难以直接影响他人社会——即使慢慢偶然传播到他人社会了,影响效果也总是以缓慢而曲折的方式发生。

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民族志的兴起,造成了一种知识后果,这就是群体作为自我与作为他者都被置于同一个表述所组成的社会景观之中,置于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这个社会结构之中。从视角来分析这种社会结构的知识关系,西方之所以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表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也就是说,从民族志来分析,作者都是西方学者或者学习西方的学者,而文本内容所叙述的都是非西方社会的事情;在共同体层次,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如果相互表述是极端不平等的,那么这种结构关系也是极端不平等的。民族志的作者在自己的社会中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者,而在共同体的关系中却支撑着其共同体的优越地位(吴晓黎:西方知识共同体的优越地位是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共同支撑的)。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成为普遍主义思维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

不过,后现代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一波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也是世界各个共同体、各个层次的力量和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吴晓黎:再结构化首先是由于政治经济层面的变化,是殖民帝国的解体)。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义

得到深刻反省,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一面之词而成立。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国际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了,世界真正变得紧密了,于是,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和他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吴晓黎:表述影响但不是决定结构位置和关系,塑造力量不是单一的,因为更重要的,还是政治经济。中国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力量上升,才到了提及软实力或文化的阶段,希望后者至少与前者相匹配。否则,你可以尽管表述,但谁会听?龚浩群:更多的共同体参与关于世界的叙事并不意味着中心的被解构或者消散,而只是说明世界的权力中心可能发生移位。如同中国崛起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学者去凝视世界是否将会造成叙事中和现实中新的不平等关系呢?或者说,通过我们的看和我们的说,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怎样的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中国学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中国学者是一个后来的参与群体。“后来”有遗憾,但是后来者必然有不一样的机会和优势。

四、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西方人类学家打造了民族志的镜子,用它来审视非西方社会;我们从西方拿来民族志方法的镜子,我们几十年来只拿它观照自己。现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族志方法其实是一面多面镜,它可以观照我们,其实更方便观照我们之外的世界。

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是要靠关于社会的叙事来支撑的。支撑西方社会科学的是关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叙事,而支撑中国社会科学的是限于中国内地的社会叙事。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科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看世界,而中国社会科学是以西方的学术眼光看中国。西方学者跑遍世界,当然也跑遍了中国各地,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吴晓黎:西方的世界叙事不是民族志单独建立的,各种以全球、人类为关怀对象的知识生产,比如黑格尔、马克思的著作,都在支撑这些世界叙事。人类学在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的知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很复杂的,人类学在肇始期试图证明人类心智的同一性,所要反驳的正是原有的文明——野蛮的西方叙事);中国学者也出国,当然主要是到西方国家(康敏:与之相反,中国的劳动人民,去得多的却是亚非拉国家。我们的劳务输出量,以亚洲最多,非洲次之,以中东的历史最为悠久),但是十分耐

人寻味的是，他们把西方只是当做一个大学，那里只是求学的知识殿堂，并不是他们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他们回国才做调查研究。

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多年，几辈学者介绍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从来没有为国人提供特定的现代社会在社区层次的实际运作的经验知识。现代社会具体是怎样的？现代生活对于个人如何是可能的？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认真提过这种问题，中国的人类学也没有当做使命来回答过这种问题，当然也就一直没有相应对象的民族志出现了。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以追求真理、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规律来自我期许的。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在政治、军事上纠缠在国际事务之中，在学术上因第一手经验研究的缺乏是处于国际之外的。我们也关心亚非拉人民，也声援发达国家的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事业，不过，这大都是在政治、道义上的努力。在知识产业上，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是一种家庭作坊，是一种自产自销的格局：学者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掘经验材料，以国内的政府、同行、大众为诉求对象（康敏：中国学术界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生产多少是有些“自恋”的，或者说是大中华主义的。我们总是先关注海外华人华侨史、华人文学、华人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贡献、海外汉学……我知道一个例子：搞海外汉学的某专家让一个熟人整理印度对中国学术经典的译介史及现状，而据她了解，人家印度根本就不那么关心中国的经典，很难找到他们翻译过什么。结果那位专家坚持认为是她的学术功底不够，而不相信印度人并不关心中国经典）。一些学科也涉及国际世界，甚至以国际社会为论题，但是基本上都是站在（或藏在）中国社会之中对外人信息间接引用与想象的混合物。没有进入世界的田野作业，没有关于国际社会的民族志作为支撑，何来以现实世界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中国的社会科学，从关于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到认知全球社会的科学，必须从最基本的海外民族志个案积累开始。中国学界的海外民族志将逐步建构中国对于世界的表述主体，中国将从民族志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在国际社会科学中，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以此为基础，作为表征社会知识生产关系之核心的“看”就必须用“注视—对视”（也就是“相视”）的范畴来对待了。获得社会知识的单方面的审视总是被抱怨包含着轻视、敌视，但是“对视”以及作为其产物的相互表述的民族志将在国际社会之间造成“相视而笑”的效果，也就是费孝通先

生所期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结果。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口都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中国学人和中文加入到关于世界的实地调查研究中来，世界社会科学无疑将因之大为改变。以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视角看世界、看彼此，被呈现出来的世界将会大不相同。

五、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新格局

因为心中有春天，我们看见嫩芽会欢欣。

海外民族志训练是未来的人类学家出师的汇报演出。没有人指望其中有多少大师的代表作，但是它们无疑都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区域的开拓性著作，更加确信的是，它们的作者是中国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在国外社会大展经验研究的开路先锋，是为我们的共同体在知识世界开疆裂土的功臣。它们的作者从熟悉的家园到远方、到异国他乡去，拓展了中文世界的空间。它们从社会知识生产的源头而来，就像涓涓溪水从雪山而来，假以时日，配以地势，必将汇聚成知识的海洋。

我们年青的人类学者已经走进世界，在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巴西，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深入一个社区进行起码一年的参与式社会调查。他们会带动越来越多的学人参与，世界上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点。他们陆陆续续地会完成自己的民族志成果，用中文书写当前世界各种社会的文化图像。他们的民族志个案今后可以组合成为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研究，对于金砖四国的综合研究，对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社会的比较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特别期盼对于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太平洋众多岛国的研究，特别期盼对于周边国家日本、韩国、缅甸、越南的研究……

海外民族志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将改变中国社会科学单一的学科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按照学科划分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学人要开展合作，并没有学科体制的平台（康敏：其实中国也有在设计上具有这种功能的机构，如社科院的各个地区的研究所，还有现在经常被提到的“东南亚学”，但这些机构的地区研究多是由一些搞历史、政治、国际关系和语言的人在做，很少或几乎没有人类学背景的人的身影。在我准备提交世界人类学大会[指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的论文里，我会用实际的数据来说明东南亚研究领域存在的这一缺陷）。民

族志比较发达的那些知识共同体,如美国、日本,在学科分列的同时还有一个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体制。在学科与地区研究并行的体制中,大学教授分属不同学科的院系,但是相同的地区研究兴趣又把不同院系的教授联结起来(龚浩群:从国外经验来看,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该国学术领域内地区研究的兴起与繁荣。美国人类学的大发展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政府对地区研究的大量投入为契机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所从事的海外民族志还更多地是由人类学界有识者的推动和人类学年轻学生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促成的,包括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在内的多学科的地区研究体系还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学科规划中来,可以说这是一场由下自上的变革。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以及所有带有偶然性的尝试都将开启新的局面,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之势)。这个方向的发展是以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为基础的,但是却不是人类学家单独能够操作的。我们刚刚开头的海外民族志事业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派生“地区研究”的机会却是靠整个学界才能够把握的。

海外民族志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领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术上也会更上一层楼。海外民族志除在共同体层次上、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之外,在技术层次、操作层次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也会是很实在的。从业者只在中国社会做调查与同时在海外社会做调查,代表着不同的眼界、不同的事实来源。更开阔的眼界对于议题的选择、对象的甄选、观念的形成都会更胜一筹。学术的精进总伴随着寻找更广泛的社会事实来源,由国际社会经验比较所支持的论说可能更加有力。

相对比较紧迫的是,海外民族志是疗治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病症的一剂良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却只在本国的社会中做实地调查。中国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外语学习上,却没有几个人是计划学了语言去国外社会做调查研究的。中国的商品拥挤在全世界各地,可是它们总是

置身在陌生的社会被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挑剔,中国学界没有能够及时为它们创造各个方面都能够熟悉的知识环境(吴晓黎:这里是说使中国商人熟悉陌生社会呢,还是说人类学为中国商品的全球扩张张目呢?笔者:这里的知识既包括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对特定物品将要达到的具体社区的认知,也包括外部世界、特定社区对中国、中国产物的认知。通过双向互动也就是“相视而笑”那种效果的互动所生产的社会知识才是理想地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国大众旅游的洪流已经从国内蔓延到国外,在世界上浮光掠影的观光所型塑的世界观是极其偏颇而危险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眼光。

凝视世界的欲望需要走出去的意志来展现。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它们被用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社会世界,看世界社会。有眼珠子就能够看,有心才能够凝视。人类学者也是知识群体的脚板子——它们要走很远的路,走很多的路,走陌生的路,也在走没有路的路。有了这样的人类学者群体,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才能走得够远,看得更远。



[参 考 文 献]

- [1] 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收稿日期 2009—07—04

[责任编辑 秦红增]

[责任校对 韦琮瑜]

[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邮编:100871。